

清华梦忆

○刘以嵩（1962无线电）



2007年10月，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纪念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华人聚会，刘以嵩学长作为嘉宾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朗诵自己的英语诗作My Chinese Soul

在故乡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嘉陵江和长江在此相汇，一泻千里，奔向东方。它们泾渭分明：嘉陵江水清澈碧绿，而长江江水浑黄。小时候常和同伴在河滩上，吧哒着一双赤脚采集鹅卵石玩耍，并倾听纤夫和船工们喊出的那动人心魄、悲壮激越的“川江号子”。在这里，我送走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

高中毕业，要为自己选择前程的时候到了。报考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把电子技术作为终身事业，这是当时双亲的考虑，也是我自己的选择。1956年8月的一天，辞别了母亲，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登上东渡的江轮，然后在武汉换乘火车

北上。

作为初次远离家门的少年学子，当我踏进这举世闻名的北国学府，就被这美丽的校园和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住了。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首推位于大草坪北边的大礼堂，它上圆下方，雄伟典雅，具有古罗马建筑风格。我曾在这里欣赏过天才音乐家马思聪在他夫人钢琴伴奏下的小提琴独奏，刘诗昆的钢琴演奏，以及刘淑芳的花腔女高音独唱等。

与西式建筑形成鲜明对照，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工字厅，则是中国古典式的大庭院。正门前悬有咸丰皇帝亲书的匾额“清华园”；里面曲廊回折，庭院相套，奇花异石，蔚然秀丽。后门外，就是清华园的名胜区“水木清华”，那里假山古亭，苍松垂柳，花香鸟语，小桥流水，配置成一幅幅绝色的景观。有时在寂静的月夜，我独自漫步湖滨芳径，就会情不自禁哼起王实甫《西厢记》中的词句：“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呜咽……”我不知道“水木清华”的名称是否来自古诗，记得《诗经》上就曾有“水木清华，婉兮清扬”之句；还记得曾有人用两首诗：“分花拂柳穿芳径，独倚孤松赏月明”，咏叹了“水木清华”的优美和情趣。工字厅西边，是清代另一个皇家园林“近春园”的遗址，我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所描绘的优美景致。

□ 值年园地

我在校时，清华大学校长是蒋南翔。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学生宿舍周围转，看望学生。他作的报告言简意赅，发人深省。一次他对同学们说：“秦桧，南宋初年丞相，当科状元，才华出众，但却是留下千古骂名的汉奸卖国贼；文天祥，南宋末年丞相，同样是当科状元，才华横溢，而他是千秋万代受人景仰的民族英雄。这表明了一个人不能只是学问好，还必须要有人正直的高尚情操。”这些话一直作为箴言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当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曾引用《周易》中的名句勉励学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蒋南翔校长也给同学们提出了“自立立人，自强不息”的八字要求。

在讲课老师中，我最喜欢的是讲授高等数学的讲师程紫明，他那严密的语言逻辑，折服了每个学生，使听他讲课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完成他布置的作业，也似乎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此外，马约翰老教授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西服领结，身材魁梧，满头银发，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作起报告来声如洪钟，不用麦克风，他强调的“生命在于运动”，富有极大的感染力。

入学第一年的学习甚感轻松。在图书馆，除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和作业外，我也借了各种课外读物浏览，其中包括大量的古典诗词。我自幼酷爱阅览课外读物，这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出于强烈的求知渴望，课堂内的知识已远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尤其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我情有独钟，视其为陶冶性灵的工具，并早年就开始习作写诗。但是不久，中华上空的政治

风云就永远结束了我的“闲情逸致”。

1957年席卷中国上空的那场政治风暴，也猛烈地冲击了清华园。同学们当然不清楚从整风到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在发出全面开展反右斗争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清华大学给全校师生做了长达5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在清华大学反右运动中，最著名的右派就要算副校长钱伟长教授了。他曾经身兼27职，红极一时；但他始料不及会因为一篇《人民日报》登载的记者访谈：《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而一夜之间由“天堂”跌入了“地狱”。另一位著名的右派是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曾在校刊《新清华》上载文《花丛小语》，对当时学校里的某些不正之风予以抨击，并由此获罪。

1957年，我所在的无线电电子学系，是两年前刚从电机系分出来的一个新系，全系仅有“两个半”教授：系主任孟昭英教授是当年中国电讯界的权威，副系主任常迥教授和年仅三十多岁的马世雄副教授都是留美归来的电子技术专家，同学们自然都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系里的“宝贝”。在反右声浪中，有人贴出了攻击他们的大字报，当时我和一些同学看了很生气，曾写过一篇为他们辩护的大字报。岂料这一张大字报并没能改变他们的厄运，他们三人全都被打成了右派。

我们班里，还有一位较年长的班干部，由部队转业而来，一直是党支部的“入党培养对象”。在一次我们都应邀参加的系里组织的“鸣放会”上，党总支书记笑容可掬地请他帮助党“整风”，要他讲讲过去曾在“肃反”运动中受到过的委

屈。这样，他也就莫名其妙地当了右派。不久，他就从无线电系调到专门“收罗”右派学生的机械系去了，原因据说是我们系属“保密专业”，与国防有关。

多年来我常常想，那场夺去了数十万知识界精英及其全家终生幸福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直至“文革”浩劫，当政治风浪如潮水般涌来时，一般人谁都难免会犯错误，伤害他人。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应当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应当真诚地为自己可能有过的过失感到内疚和忏悔。

1958年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声浪中到来的，当时一句风靡全国的响亮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似乎“超英赶美”的目标近在咫尺，人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一夜之间要在中国实现了。当时，学校还特别邀请了诗人徐迟、沙鸥等来校座谈，他们以诗人特有的激情畅谈着：“粮食生产过剩怎么办？”

这一年我们参加了修建北京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暑期校办工厂的劳动，并在校园里搞所谓“小土群”式的“全民大炼钢铁”。当然，这种劳民伤财的土法炼钢的结果，只能是“炼出”一堆废渣。此外，还有由中央所倡导的“全民写诗”、“全民除四害”等群众性运动。

从1958年到1959年，清华大学又开展了“教育革命”，计划把清华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并想以长达10年的学制使毕业生达到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水平，后来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把学制减到了6年。在我们的第三学年，系里还进行了“半工半读和半研三结合”的试验：把这一学年分为了三个学期，其中两学期上

课学习，另一学期主要参与教研组的科研工作及电子车间的组装调试。

“大跃进”左倾冒进的做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全国进入了“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清华学生的确是受到了特殊的保护和关照，粮食定量较高，我当时的定量是每月34斤，但副食供应依旧严重匮乏。在这种情势下，学校很注意学生的劳逸结合，大幅度减少学生的社会活动，使学生们节省体能消耗，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而最后这两年，也是我在系馆里完成大学专业学习最紧张的时期。

1962年秋，在度过了6年难忘的岁月之后，我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这是对我的成长和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6年。在这具有理工结合性质的专业学习中，学校重视对学生从理论到实践严格而全面的训练和培养：前两年是大学基础课，第三年是专业基础课，第四、五两年是专业课和专门化课，最后一年是所谓“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是研制3厘米波段空用多普勒导航雷达接收机，属于系里承担的一项国防科研任务的一部分。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和训练，学生都能具有较深而广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以及较强的设计开发和实际动手能力，为从事科研、教学或生产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我离开了母校清华，踏进相隔不远的中国科学院，开始了我的科研生涯，也踏上了坎坷求索的漫漫人生路。年复一年，光阴荏苒，当初是风华正茂，如今已双鬓雪染。但昔日那峥嵘的岁月，美丽的校园，却一直铭刻心田，令我梦绕魂牵。